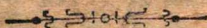


時事參考資料

第一期

目錄



最近國內時事述評

國民黨徵糧政策下的人民負擔與糧食損耗

當前大後方民營工業的危機

物價與農工生活（轉載）

延安時事資料社編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印

時事參考彙編 第一期

晉察冀日報社印

時事參考資料

第一期

目錄

最近國內時事述評

國民黨徵糧政策下的人民負擔與糧食損耗

當前大後方民營工業的危機

物價與農工生活（轉載）

延安時事資料社編

最近國內時事述評

記者

(一) 大後方政治近況

自從去年九月上半月國民黨開了一個十一中全會，決議要在抗戰勝利一年後召集國民會議，製定憲法，並在同月下半月在國民黨政會上成立了一個憲政實施協進會，及政府命令各地討論『五五憲草』後，大後方各地某些重要城市裡產生了憲政促進會、期成會、研究會、應徵會一類的組織，開始了以討論『五五憲草』為中心的一點憲政運動。其中活動得比較起勁的，大都為一些開明士紳、名流學者、民族企業家及一些不滿意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上層分子，其中有自由主義者，有民主主義者，有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物，有青年黨、救國會、第三黨、國社黨等的領袖，甚至還有國民黨內以孫科為代表的少數元老。綜合各方面的要求，主要的不外下列三條：（一）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二）取消一黨專政，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存在；（三）地方自治。

顯然的，今天在大後方憲政運動中比較活躍的人物，主要的還是中間派的分子，他們所要求的憲政，基本上還是自由主義的憲政，他們的活動一般還限制在『議論』範圍之內。大多數人民，不僅是工人與農民，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知識分子，還沒有能够參加。這是因為國民黨自十一中全會後，它的專制主義並無絲毫改變的緣故。它在各省、各縣召集的什麼省參議會、縣參議會，以及在各鄉鎮召集的什麼『鄉鎮民代表會』，純粹是一黨包辦的東西，其中並無絲毫憲政的意味，相反的，它急於召集這類御用會議的目的，正是爲了由其一黨控制這類機關，以反對這些機關將來的民主化。它對於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壓迫，並無絲毫放鬆的表示。它今天的『民主』，就只在允許那些『和平』的『安分』的社會上層人士，在它認爲『安全的』環境裡『談談』憲政。它不贊成這些人到羣衆中去談，更不贊成羣衆參加到運動中來。它知道，羣衆一參加到憲政運動中來，那就不是爲了『談談』，而是爲了行動。這是它所最害怕的。所以國民黨不但願民衆參加運動，而且直接反對他們進來，因此民衆也就不能不站在運動的外面。

國民黨的專制主義，自十一中全會以來未有絲毫改變已如上述。即在它的言論方面，亦未見有什麼新的變化。它可以通過明天實施憲政的『決議』，但今天它的一切言論，仍然是反對民主的。在國民黨的報章雜誌上，我們所看到的仍然是連篇累牘的反對民主政治的文章。蔣介石氏自從去年三月，他那本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主張專制主

義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以來，雖在全世界民主人士及全國人民中遭受到了辛辣的駁斥，然而他仍然沒有進步的表示。在他今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青年節『告青年書』中，還是老一套反對給人民以自由權利的理論。國民黨十二中全會，對於如何真正實行民主政治問題，亦無絲毫回答。最近又在進行什麼『守法運動』，以對抗民主運動。

關於國民黨書報檢查制度的惡聲，早已中外遠揚。最近在國內外輿論的壓迫下，曾有『準備放寬尺度』的表示（見四月十九日，梁寒操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五月五日，中央社關於此事，亦有廣播，說要『改善』檢查制度。但這次國民黨十二中全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案，仍然沒有什麼基本的改變，其中只有『局部廢止事前送檢』一句話，算是要『局部』改善的一種表示。但在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基本條件之下，這類含糊糊糊的話，究竟有什麼用處？

● 在國共兩黨關係上，自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亂罵一頓共產黨，但對共產黨問題表示仍然要『政治解決』之後，國共間的緊張關係，總算和緩了一些。但國民黨方面，在政治上對共產黨的攻擊，却沒有停止過；對八路軍新四軍的地方性的磨擦，仍然經常發生；對大後方共產黨的組織與共產黨人及八路軍辦事處的高壓，迄未放鬆過；那些因愛國活動而無辜被捕及皖南事變中被俘的將士，至今久羈縲絏，慘遭非刑，未被釋放；對陝甘寧邊區軍事的與經濟的封鎖，亦未放棄；對共產黨、邊區、八路軍的造謠污蔑，更是層

出不窮；甚至西安國民黨、政、軍負責人及其特務機關，公開發起『追悼會』，追悼所謂『在延安被慘殺親友』王實味、袁寶華等，把活人當做死人，串演反共的滑稽劇（見西安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各報）。

但共產黨方面，自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後，爲了顧全大局，力求團結，在這個時期內，停止了對於國民黨的批評，並且曾經公開由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提出了解決國共兩黨關係以利團結抗戰的具體方案（見三月十四日解放日報）。最近更由於國民黨方面的提議，中共中央特派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去重慶繼續過去中斷已久的談判。在林伯渠同志於五月初到達西安後，即同代表國民黨中央飛劉西安歡迎他的張治中、王世杰二氏初步交換了意見，不久三人同飛重慶，林伯渠同志即同蔣介石氏見了面。在形式上看來，國民黨對此次談判，很爲重視，而且中央社還不止一次廣播了林伯渠同志的行止。但國民黨採取這種姿態的真正意圖，究竟是什麼，現在還不很明瞭。有人推測，這是因爲它的獨裁統治遭受了中外輿論的批評，它在軍事上、財政經濟上遇到了嚴重的困難，使得它不能不拉一下中共，以粉飾門面，渡過難關；在現在情況下，國共間個別問題的解決或許是可能的，但兩黨關係的合理解決，如果國民黨不放棄一黨專政，無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那是不可能的。這種推測的是否正確，當然還待以後事實的證明。

（二）豫西戰役

自去年八月下旬英美在魁北克會議決定加強在東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南太平洋、澳洲對日寇的攻勢，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決定對於國共問題採取「政治解決」方針，第三次反共高潮低落下去，日寇誘降失敗之後，日寇即在十月三十日發表所謂「中日同盟條約」，並開始了十一月上旬到十二月向湘北常德區域的進攻戰役。從那時起，到今年四月止，日寇看到其盟友德國的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進攻及其援華的活動日益積極，國共關係和緩，誘降無望，而其海上運輸的困難却日益增加，乃決定開始新的軍事進攻，企圖打通平漢、粵漢鐵路交通綫，以確保其大陸交通的命脈，並給國民政府力量以新的打擊，逼其投降，以準備其很快會到來的對英美的決戰。於是有四月十八日開始的豫西戰役。

這次戰役，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國民黨軍隊戰鬥力的空前低落。

四月十八日敵人以五萬餘衆渡過黃河泛濫區向豫西進犯，我國軍隊以七倍於敵之兵力，在第一戰區正副司令長官蔣鼎文、湯恩伯指揮之下，不到三十七日（到五月二十五日洛陽失守爲止）失地三十八縣，計有鄭州、洛陽、新鄭、長葛、許昌、臨潁、鄆城、西平、遂平、確山、消川、尉氏、鄆陵、廣武、汜水、滎陽、鞏縣、偃師、新安、渾池

、陝縣、靈寶、密縣、禹縣、襄城、舞陽、登封、臨汝、郊縣、寶豐、葉縣、魯山、宜陽、伊川、伊陽、嵩縣、洛寧、盧氏。其中有的縣份，後來因敵人的自動撤退已爲我軍「克復」了的！

在這次作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湯恩伯的嫡系中央軍。這個素稱最有戰鬥力的中央軍主力之一，在敵人面前，簡直是不戰而潰，望風而逃，而且在潰散中更是姦淫擄掠，無所不爲。這種情形，驟看起來似乎非常奇怪，但如果加以研究，則這是湯恩伯一類的中央軍的全部作法的必然結果。原來湯恩伯這，在河南所實行的反人民、反共產黨的反動政策，已經使河南的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比如軍隊原有公糧吃，但湯軍還是就地徵糧，徵來的糧不是爲了吃，而是爲了出賣，這樣以「徵了賣，賣了徵」的方法，對老百姓實行公開的掠奪。說是要築工事，向老百姓徵木料，老百姓只得拆廟，買樹來交木料，但湯軍拿到木料又當作木柴，強迫聯保賣出，然後又徵。所以河南老百姓的痛恨湯恩伯比痛恨日寇還要厲害。河南人說：『河南四荒，水、旱、蟲、湯』。河南人還說：『寧願敵人殺，不願湯軍紮』。所以此次日寇進攻中，河南人民不但不援助國軍，而且到處發生解除湯軍武裝的自衛鬥爭。這種國軍與人民的尖銳的對立，即爲日寇所充分利用。日寇此次進攻，曾提出這樣欺騙的口號：『打倒湯恩伯，爲河南人民復仇！』而且相當的採取了一些不亂捉、亂殺、亂搶的懷柔政策。這在河南人前面更顯得敵人

湯恩伯還要好些，因而發生了部分人民寧願歡迎敵軍而反對湯軍的反常現象。這是從軍民關係方面而言。在軍隊內部，則官兵的對立，十分嚴重。中央軍軍官中有不少自高自大，作威作福，貪污腐化，貪生怕死之徒，對上則吹牛拍馬唯恐不力，對下則欺壓剝削唯恐不足。新從軍官學校畢業出來的一些國民黨員、三青团員一類的毛頭小子，即升軍官，老兵即使勇敢，有本領，有戰功，還是一輩子當老兵，不得翻身。新兵則更是被欺侮壓迫的對象。官兵生活的相差，更是天上地下。官長對於士兵生活採取的態度，是「兵逃則吃空額，兵在則吃兵餉」，每月二百元副食的津貼，還要給官長扣去一半。因此士兵吃不飽，不得不向老百姓勒索或採野菜樹葉充飢。這樣要使官兵團結，將士用命去對付敵人，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敵人一來，官不顧兵，兵不顧官，軍隊自然就潰散了。這些潰散的官兵，更利用機會大發洋財，對逃難的老百姓的財物，大肆搶掠，這更引起了人民的憤恨。這是從軍隊內官兵關係而言。在軍隊與軍隊之間，也是矛盾百出。首先是中央軍與「雜牌軍」之間的矛盾。中央軍處處看不起雜牌軍，欺侮雜牌軍，一切兵員物資的補充，首先輪到中央軍，雜牌軍是輪不到的。中央軍的軍官，很快的從團長升到師長，從師長升到軍長，從軍長升到集團軍總司令，但雜牌軍的軍官則上升的希望很少。凡窮苦、困難、危險的地方，要雜牌軍去担任防務，而富庶、太平、安全的地區，則留給中央軍自己。但正因為如此，有些雜牌軍的戰鬥力反而要比中央軍強些。此次

保衛洛陽的雜牌軍十四集團軍劉茂恩部是比起湯恩伯的中央軍來，要勇敢堅決些，民力意識也要濃厚些，在敵人誘降前面，未見動搖。第四集團軍的孫蔚如部，在鞏縣一綫也打得不壞。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川軍將領）還以身殉國。這些都是『雜牌軍』勝過『中央軍』的明證。其次，在中央軍內部，即在蔣鼎文與湯恩伯間，蔣湯與胡宗南間，也是矛盾百出，這亦爲衆所週知的事實。這是以部隊內部的關係而言。

關於這個戰區的上層指揮機關，那是一個非常消極的組織，平時，同敵人和平共居，在政治上專力於反人民、反共工作（實行『共同防共』），壓榨人民；在經濟上則販毒走私（實行『經濟提攜』），大發洋財。關於後者，敵人曾說過：『多數經紀人、商人羣集於戰區司令部，而有成爲交易所的中心機關之感』（同盟社上海二十七日電）。那是一種墮落的、腐化的、享樂的、和平的空氣。在敵人前面，作戰準備是毫無的，當敵人調兵遣將，實行進攻的前夕，他們還以爲這不過是照例的調防行動，毫無警覺。但一聞敵人開始進攻，就張皇失措，退却逃跑，三十七天送掉了三十八個縣城！

在敵人先頭部隊向潼關威脅時，陝西八戰區胡宗南的軍隊固然有了局部的調動，但調至河南增援的，却仍然是極少數。胡部的大多數，仍然佈置在陝甘寧邊區的周圍，並且遣出種種謠言說『八路軍要打到西安啦！』『共產黨要擴大地盤啦！』以此爲藉口來掩蓋他怯於對日，與勇於對內的可恥行動。尤其奇怪的，正當河南前綫緊張，陝西危急的

時候，胡宗南的二十九集團軍（中央軍嫡系）的兩個軍四個師（四十二軍及新二軍）紛紛向新疆調動。大概這又是什麼「防共」的把戲；壓迫回民，併吞異己，或許亦爲其主要目的之一部分。

但國民黨方面，對於河南戰役失敗的原因，當然是不會去認真檢討的。他們把河南失敗的一切問題，歸根於現代武器的缺乏，及美英援助中國之努力不足。五月三日，梁寒操在答覆外國記者的詢問時，曾說：「目前戰爭關鍵是滇緬路之重開，我們擁有優秀之人民與軍隊，一旦現代武器到手，勝利自有絕對把握」（中央社渝三日電）。五月十日，張平羣（代表行政院）在招待記者席上說：「河南戰爭演變至今，並非訓練問題，其主要關鍵仍在我軍之缺乏精良裝備及優勢武器，無論受有何等優越訓練之軍隊，倘無優良武器，自難制勝。……前線將士及後方人民，數年來均遭莫大犧牲，深望盟邦今後加緊援助，增多供應……倘具決心，斷無難事，只視盟邦努力如何耳」（中央社十日渝電）。可見，國民黨方面一切都無問題，一切問題只在坐待「現代武器」到來，及盟邦人士的努力！

敵人的進攻，現已擴大到湘鄂，以後抗戰的趨勢，很值得我們的密切注意。

（三）財政經濟問題

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在抗戰前一年是十一萬萬元。自抗戰後，逐年增加。一九四〇年全年支出爲七十萬萬元，一九四一年爲一百十四萬萬元，一九四二年爲一百七十三萬萬元，一九四三年爲三百七十萬萬元（有的估計爲五百萬萬元）。一九四四年據日本『讀賣新聞』的估計爲七百三十五萬萬元（見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東京電），我們估計，大約在八百萬萬元以上，即比抗戰前超過八十倍！爲了應付大量的支出，孔祥熙氏用了一切方法，提高稅率，增加稅收，以加重人民的負擔。我們拿徵糧借糧爲例，即可看出這種情況。據今年二月二十五日糧食部長徐堪的報告，一九四一年政府糧食收入爲五千三百萬市石，一九四二年爲七千一百萬市石，一九四三年爲七千六百萬市石，今年則規定爲一萬萬市石（縣市附徵及積穀，還不在內）。如以四川一省爲例，則一九四一年徵實徵借徵購爲一千二百萬市石，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均爲一千六百萬市石（見『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二期），今年則規定爲二千萬市石，再加省縣級等附加，約爲二千五百萬市石（見『工商新聞』四月三十日）。其他各種稅收的增加，也是如此。但即使如此搜刮，政府年來每年的收入，平均只够支出的一半。這不够的數目字，只有靠借債來彌補，大約現在正在推銷的三十萬萬元『同盟勝利公債』，及二百二十九萬萬元的所謂『鄉鎮公益儲蓄』，就是今年用來彌補這種不足的。如果借債還不够呢？那天孔祥熙歷來的辦法就是『銀行透支』，即增發鈔票。如衆所共知，孔祥熙是財政部長，又是

中央銀行『總裁』，所以多發鈔票，是不成問題的。關於鈔票發行額，政府方面向來保守秘密，我們無法知道。但據桂林『大公報』去年四月八日估計，當時發行額比戰前增加五十倍，即約等於七百五十萬萬元（戰前發行額，政府公佈為十四萬萬零七百二十萬元），那末到現在又一年多了，估計起來，大約總要超過一千萬萬元（有的估計在一千五百萬萬元以上）。其實，不但在『銀行透支』上，銀行要發行鈔票，即發行公債，實際上也要靠銀行發行鈔票，因為過去公債的承購者主要為銀行，銀行拿了公債就可以作為發行法幣（在中央銀行方面說）或領取法幣（在其他銀行方面說）的『保證準備』。因此政府財政赤字愈多，公債發行的愈多，法幣自然也發的愈多。最近幾月來，法幣的印發速度（中國法幣，大部分在外國印刷），越來越跟不上日益擴大的需要，於是市面上忽然感覺到『銀根奇緊』，以致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發行一元、五元、十元的『關金券』（每元合法幣二十元），並發行每張大至二萬元的『本票』來代替法幣。顯然的，大後方的金融，已經落進了惡性通貨膨脹的泥坑。

由於不斷的增加稅收，及大量的鈔票發行，大後方的物價如脫韁之馬般的向前狂奔。蔣介石氏提出的什麼『平價』『限價』『議價』政策，均已一一的宣告破產了。據陝西省銀行經濟研究室的統計，今年三月初的物價較之戰前，平均漲三百倍以上，每百元法幣僅合二十六年之三角左右（『見經濟新聞』三十六期）。那個在三月八日外國記者

招待會上說當時物價較之戰前計漲二百三十倍的張平羣（見中央社三月八日重慶電）於是近五月二十一日同樣的招待會上說，「重慶最近零售物價總指數較民國二十六年計增四百五十倍」（見中央社重慶三十一日電）。這不是說這二個半月中物價突然漲了二百二十倍，而是說三月八日的那個張平羣，是在有意的撒謊。事實上，現在物價較之戰前，一般已漲至五百倍以上，有的貨物甚至已漲到一千倍！

這是一個一進去跑不出來的惡魔的循環圈。財政困難，必須增加稅收，增發鈔票，這就促進了物價的高漲；物價高漲，財政愈困難，就愈要增加稅收，增發鈔票，這就愈要促進物價的高漲（大後方現在流行的話，說：『稅收增加一倍，歲出增加二倍，人民支出增加十倍』，多少可以表示出這種循環）。國民政府現在就落在這樣的循環圈裡面。在這個循環圈裡面，國民經濟的生機，受到摧殘，人民的生活，日益惡化。這是從財政方面來說。

至於國民黨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如統購統銷，專賣制度，限價平價，金融管制等等那一套所謂『統制經濟』，實際上也同樣帶有增加稅收的財政目的。

國民黨的所謂統制經濟，簡單說來，就是用平價、限價、統購的方法，賤賣生產品，剝削生產者（其中有工人、農民、手工業者、民族工業家、正當中小商人）；再用統銷、專賣、限價等方法，貴賣生產品，以剝削消費者（其中又是工人、農民、兵士、手

工業者、公務員、自由職業者、民族工業家以及其他絕大多數人民。這種統制經濟，既打擊民族工業、手工業與農業生產，又打擊全國絕大多數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生活。民族工業與手工業的嚴重危機，農村經濟的衰落，以及人民生活的惡化是這種統制經濟的必然結果。同時，這種統制經濟又鼓勵壟斷、操縱、囤積居奇的「投機商業」的發展，使投機商業得到了特殊繁榮，使投機商人異乎尋常的肥胖起來了。國民黨區所有銀行的放款（中央、中國、農民、交通四大國家銀行在內）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都是投機商業的放款，所謂「工貸」「農貸」的數量，是微乎其微，而且就是在「工貸」、「農貸」中，真正為工業家及生產者所得到而用於生產的投資，更是渺小不足道的（關於這方面的材料，參考本期關於「民營工業危機」一文）。

國民黨的財政經濟政策就是這樣使生產衰落（為生產必需的商業在內），使大多數人民（生產者與消費者）骨瘦如柴，使少數商業投機家胖如蠢豬的！

工農業生產的衰落，使全國物資更加缺乏，再加上投機商業的發展，投機家的投機操縱、囤積居奇，興風作浪，搗亂市場，自然更促進了物價的高漲。

大後方的報紙雜誌，近來不斷的提出反對投機操縱、囤積居奇的要求，要求政府嚴厲處置「奸商」，以平抑物價。但究竟誰是好商呢？比較大胆的人，說，這些奸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某種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人物」（見三月十三日「廣西日報」）

千家駒氏的論文)。如果打開天窗說亮話，這些奸商就是孔祥熙一類的人物，就是那批大官僚、大軍官、大商人、大買辦、大資本家、大地主！國民黨的統制經濟說，就是代表這批人的經濟利益的理論。

我們這樣說，是完全合乎事實的。國民政府的全套金融、財政、經濟機關以及那些半官半商的大銀行、大企業公司大都是做的這一套投機操縱、囤積居奇的把戲。國民政府的那些聲勢煊赫的大官僚，大軍官，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搞『經濟』發財的。孔祥熙是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四行總處副主席、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董事長，又是中國興業公司董事長、山西裕華銀行老闆以及其他無數銀行與商號的董事、股東、後台老闆。張羣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又是川康興業公司的董事長。薛岳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又是湖南民生實業公司的董事長。以及諸如此類等等（現在各省都有企業公司，甚至一省有多至二、三個的），他們所搞的把戲，可以拿今年三月間的黃金投機風潮（見五月十一日「解放日報」）做一個具體例子。孔祥熙一隻手以國民政府官方代表資格拋出黃金（這次共拋出五萬兩），他另一隻手以山西裕華銀行老闆的私人資格，大量收進。這樣盡量刺激黃金價漲到飽和點時，他即以高價大量拋出，這大量拋出，又使金價下降。這樣一轉手之間，山西裕華銀行，每兩至少可撈進一萬元，幾天中間就發了五萬萬元的大財！當然，這並不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而是一個最普通的例子。

許多人爲政府當局的一些空話所迷惑，以爲政府還是要反對投機操縱，囤積居奇的。而政府有時爲維持其威信，也發佈一些反對投機操縱、囤積居奇的法令條文，有時還裝腔做勢，採取封店、罰款、捉人甚至殺人等辦法。其實，這完全是樣子，這裡倒罣的，並不是奸商的巨頭，而不過是一些他們所不歡喜的、同他們沒有親密關係的中小商人。舉一個例子吧：今年年初，政府說要檢查銀行倉庫，看銀行有無囤積居奇情事。那種「檢查」當然也不過是敷衍了事的勾當，然而仍然發現了很多囤積居奇的「秘密倉庫」，據一月二十二日「經濟新聞」載昆明消息：「此間檢查銀行倉庫，發現秘密倉庫七十八所，各行存貨證件，均不按期送審，所囤者以汽車零件爲最多，其次爲疋頭及其他百貨，在調查前均多逃避」。這還不又是大官僚、大銀行家合唱的雙簧。

當然，這還算是他們的「合法利潤」！至於公開的掠奪、走私（美其名曰「搶運」）貪賊枉法以及各種「非法的」利潤，那更是他們的家當便飯，不必多說了（見本期關於徵糧資料）。

他們就是這樣把全國財富集中到最少數的大官僚、大軍閥、大商人、大買辦、大地主手裡去，使全國的經濟發生嚴重危機，使災荒擴大，使全國人民處於飢餓的水平綫下。但他們這樣做，又擴大了他們的「投機商業」與生產的矛盾，及「投機商業」與人民購買力的矛盾，也就擴大了他們的少數人與絕大多數人民的矛盾，這些矛盾發展的結果